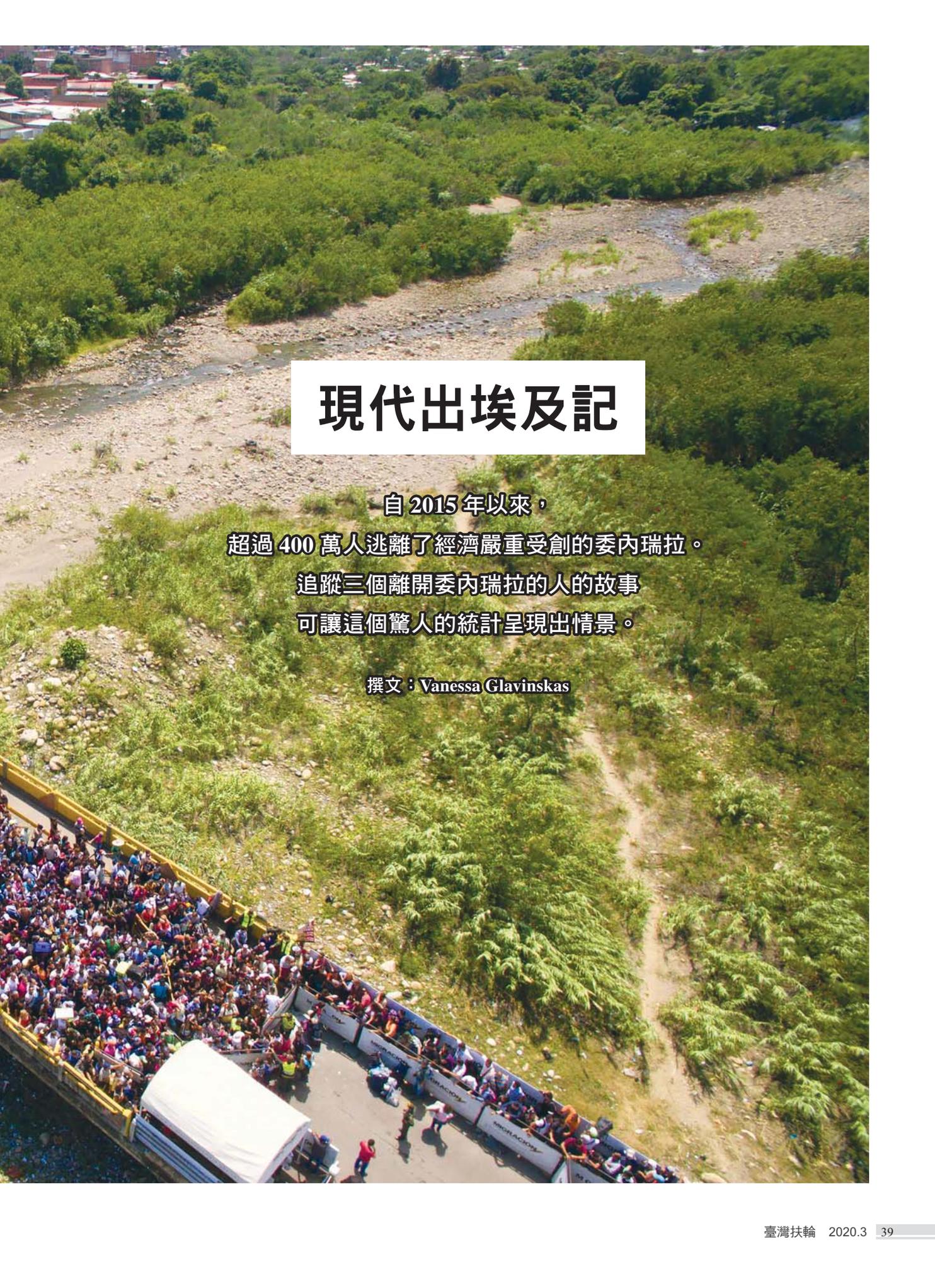




JUAN PABLO COHEN / LA OPINION

An aerial photograph showing a wide, rocky riverbed with a small stream of water. The surrounding area is lush with green vegetation. In the foreground, a large crowd of people is gathered on a bridge or road, with some individuals standing near a white truck. The scene suggests a significant event or migration.

現代出埃及記

自 2015 年以來，
超過 400 萬人逃離了經濟嚴重受創的委內瑞拉。
追蹤三個離開委內瑞拉的人的故事
可讓這個驚人的統計呈現出情景。

撰文：Vanessa Glavinskas



墨西哥市赫克特·赫雷拉 (Héctor Herrera)

赫克特·赫雷拉 (Héctor Herrera) 正開車送他的父親前往委內瑞拉東北部的何塞·塔迪奧·莫納加斯 (José Tadeo Monagas) 國際機場，這時他們正接近政府設立的一個食物站。即使在凌晨 5 時，排隊買東西的人也很多。「我從沒想過我會生活在這種痛苦中，」赫雷拉的父親說。突然，兩個在爭奪一隻冰凍雞的男人在他們面前的街道上打了起來。「那一刻，我父親對我說：『兒子，如果你有機會離開，就走吧。』」赫雷拉回憶道。「『我會想念你，雖然分離很難，但生活水平這樣低，快無法活下去了。』。」

那是在 2015 年夏天。作為一名教師，赫雷拉現年 28 歲，是馬圖倫·胡安尼柯 (Maturín Juanico) 扶輪青年服務社的社員。上世紀 80 年代作為委內瑞拉東部石油之都的馬圖倫 (Maturín) 如今因國家崩潰而陷入癱瘓——對於住在那裡人來說，這種經濟崩潰比美國的大蕭條還要嚴重。根據 2018 年公佈的一項調查，10 個委內瑞拉人有 9 個收入不足以購買食物，超過 1,700 萬人陷入極端貧困。英國廣播公司 (BBC) 報導，絕望的父母們紛紛把孩子送走，而沒有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挨餓。隨著 400 多萬人逃離委內瑞拉，這些情況火上添油，促成拉丁美洲歷史上最大的移民。經濟學家說，委內瑞拉的崩潰是至少 45 年來戰爭之外最嚴重的一次崩潰，而布魯金斯學會預測，委內瑞拉的難民危機將成為「現代歷史上規模最大、資金不足最嚴重的危機」。從遠處看，這些事實和統計數字可能非常枯燥，使陷入這場社會和經濟災難的個人模糊不清。但是，三個逃離委內瑞拉的難民的故事凸顯出赤裸裸的實際情況。愛德華多·何塞·坎佩查諾·埃斯卡羅納 (Eduardo José Campechano Escalona) 是來自巴西梅托 (Barquisimeto) 的扶輪社員，因公開反對政府政策而逃往秘魯。維多利亞·加西亞·巴菲戈 (Victoria Garcia Baffigo) 曾是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在她以前的寄宿家庭開始擔心她在委內瑞拉的安全和未來之後，她回到了美國。在他父親的建議之下，赫克托·赫雷拉只帶著 200 美元和有地方可以住的承諾，便離開了墨西哥。他們每個人都與扶輪有關係，到最後，扶輪是他們的希望，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他們的救贖。

在 2015 年 11 月 10 日，赫雷拉離開委內瑞拉那一天，他為自己拍了一張照片來紀念這一刻。「現在看這張照片，我看到的是恐懼、前途茫茫，和悲傷，」他說。幸運的是，他透過扶輪青年服務社認識了費迪南多·埃斯基維爾 (Ferdinando Esquivel)。

2013 年，赫雷拉在訪問墨西哥時會見了埃斯基維爾，他現在是齊納卡特佩克 (Zinacatepec) 扶輪社的社員。這兩人成為好朋友，埃斯基維爾主動表示，如果赫雷拉決定離開委內瑞拉，他願意協助。當時，赫雷拉認為委內

瑞拉會有所改善。但兩年後，生活變得更糟。「商店沒有東西賣，」他說。「連衛生紙都

「我的計畫是把家人救出來。我對委內瑞拉的情況不抱任何改變的希望。我的國家受到重創。」

沒有。」他有護照，但換不到美元，因此他買不到飛機票。於是埃斯基維爾買機票給他，並邀請赫雷拉留在托盧卡

(Toluca) 附近的一個小鎮。兩週後，赫雷拉感謝他的朋友，並登上了一輛巴士，坐了 40 英里路到墨西哥市，他希望在那裡找到一份能給他工作簽證的工作。

在墨西哥城下車時，赫雷拉開始驚慌失措。「往左？往右？我不知道要去哪裡，」他回憶道。感覺就像我的腳沒踩在地面上。」他找了個地方坐下來，掏出手機給阿隆索·馬塞多 (Alonso Macedo) 發簡訊，他是他在墨西哥的一個扶輪活動認識的朋友。馬塞多同意來接他，讓他一起同住幾天。但如果他不來呢？赫雷



愛德華多·何塞·坎佩查諾·埃斯卡羅納 (Eduardo José Campechano Escalona)
在秘魯的特魯希略 (Trujillo)

拉想。我今晚要睡在哪裡？還好，馬塞多出現了。

「在那之後，我每天都去找工作——任何能讓我拿到居留文件的工作，」赫雷拉說。「我睡不著，所以晚上我會上電腦找工作。」最後，一所由教英語的委內瑞拉人經營

的學校請他去面試，但學校距離墨西哥市有4個小時。於是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他沒地方可住。接待他的那位朋友正在旅行。

「那天晚上颳暴風雨，」赫雷拉說。「我走進一家餐館，打開筆記型電腦，開始向

扶輪及扶輪青年服務社的人發訊息，我不認識這些人，但我透過臉書與這些人有聯繫。」他別無選擇，只能問陌生人是否願意接受他去過夜。他終於得到了蘿拉·馬丁內絲·蒙蒂爾 (Laura Martínez Montiel) 的回應。他們彼此不認識，但他們透過扶輪青年服務社在社交媒體上有幾個共同的朋友。她給了他她的位址，並告訴他搭計程車。

赫雷拉回信解釋說，他沒有足夠的錢，所以他們同意在馬丁內絲準備參加聖誕聚會的一個較近的社區見面。「我當時很落魄，」赫雷拉回憶道。

「我全身都是濕的，而且衣服髒兮兮。」他擔心馬丁內絲會看他一眼後就改變主意，不接待他了。她並沒改變主意，而是帶他回家，

把他介紹給她的母親，她母親還給他洗衣服，弄東西吃。他解釋說，第二天他去面試，他們一起規劃如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那裡。凌晨6時，馬丁內絲送他去地鐵。

當赫雷拉到達目的地接受面試時，他看到了一張熟悉

的面孔。原來幾年前他審閱過面試官的論文。談了一會兒後，面試官問赫雷拉能否下週一開始上班。「不行，」他回答，「我想從今天開始。」

赫雷拉的工作是打幾百個電話，為學校尋找客戶；如果有人註冊，赫雷拉就有佣金拿。他和馬丁內絲及她母親又待了一個星期，單程上下班4個小時，直到他要求預支工資，這樣他就可以租一間離工作更近的公寓。「1月15日，我第一次拿到佣金，」他說。「這是一個解脫，因為到14日，我只剩2美元。」

到了4月，赫雷拉被提升為廣告經理，7月，他終於拿到了工作許可證。兩年後，他找到了一份更適合他的教學技能的工作，在一家公司擔任培訓師，為企業提供有關如何簡化流程的建議。

「我開始在這個美麗的国家講課，」赫雷拉說。「但在2018年12月3日，我收到一封來自國家移民管理局的電子郵件，說我必須在20天內

離開墨西哥。」移民局拜訪了他的前雇主英語學校之後，向他發出了非法移民警告。當他們按鈴時，沒有人開門，所以他們把它標示為假公司。「我簡直不敢相信，」赫雷拉說。「我一路走來還算順利，但現在比剛開始時更糟糕，因為我已經沒有居留證件。我必須重新開始。」

「離開很痛苦，」坎佩查諾說，「但我們非常感謝這個國家給予的機會。現在我們感到安全了。」

「離開很痛苦，但我們非常感謝這個國家所給的機會。現在我們感到安全了。」

在過去的一年裡，赫雷拉在一名公設辯護人的幫助下與移民警告作鬥爭。只要它仍然懸而未決，他就有被驅逐的危險。他正在尋求政治庇護，以便能夠留下來，但隨著

委內瑞拉危機的惡化，有數千人要求庇護，他僅是其中之一。赫雷拉說：「現在委內瑞拉人一抵達機場，墨西哥立即將他們遣送回去。」不過，他說他不會放棄。「直到我取得簽證的夢想實現，我才會停下來。」

愛德華多·何塞·坎佩查諾·埃斯卡羅納(Eduardo José Campechano Escalona)的焦慮症於2015年開始發作。委內瑞拉第四大城市巴基西梅托(Barquisimeto)扶輪社前社員坎佩查諾(Campechano)說：「我的孩子無法上學或外出。他們不得被關在公寓裡。」

雖然他和他的妻子是大學教授，但他們的收入不再足以應付基本生活必需品。當時，惡性通貨膨脹為181%。（在2019年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每年的通貨膨脹率為200,000%。）此外，幾起事件使坎佩查諾相信政府針對他。

危機的起源

2014年全球油價大幅下跌導致委內瑞拉經濟迅速下滑，原本已處於政治動盪之中的委內瑞拉，經濟崩潰更惡化。當時，委內瑞拉依靠龐大的石油儲備來獲得其出口收入的96%，約占政府預算的一半。為了支付開支，政府開始印鈔票，導致惡性通貨膨脹。2018年，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再次當選總統，被廣泛批評為選舉舞弊，促使國際制裁加劇，進一步瓦解了經濟，並引發了政治僵局：有50多個國家不承認馬杜羅為委內瑞拉總統。

不斷成長的移民趨勢

估計委內瑞拉移民和難民的人數

2005年 437,280

2010年 556,641

2015年 695,551

2019年 450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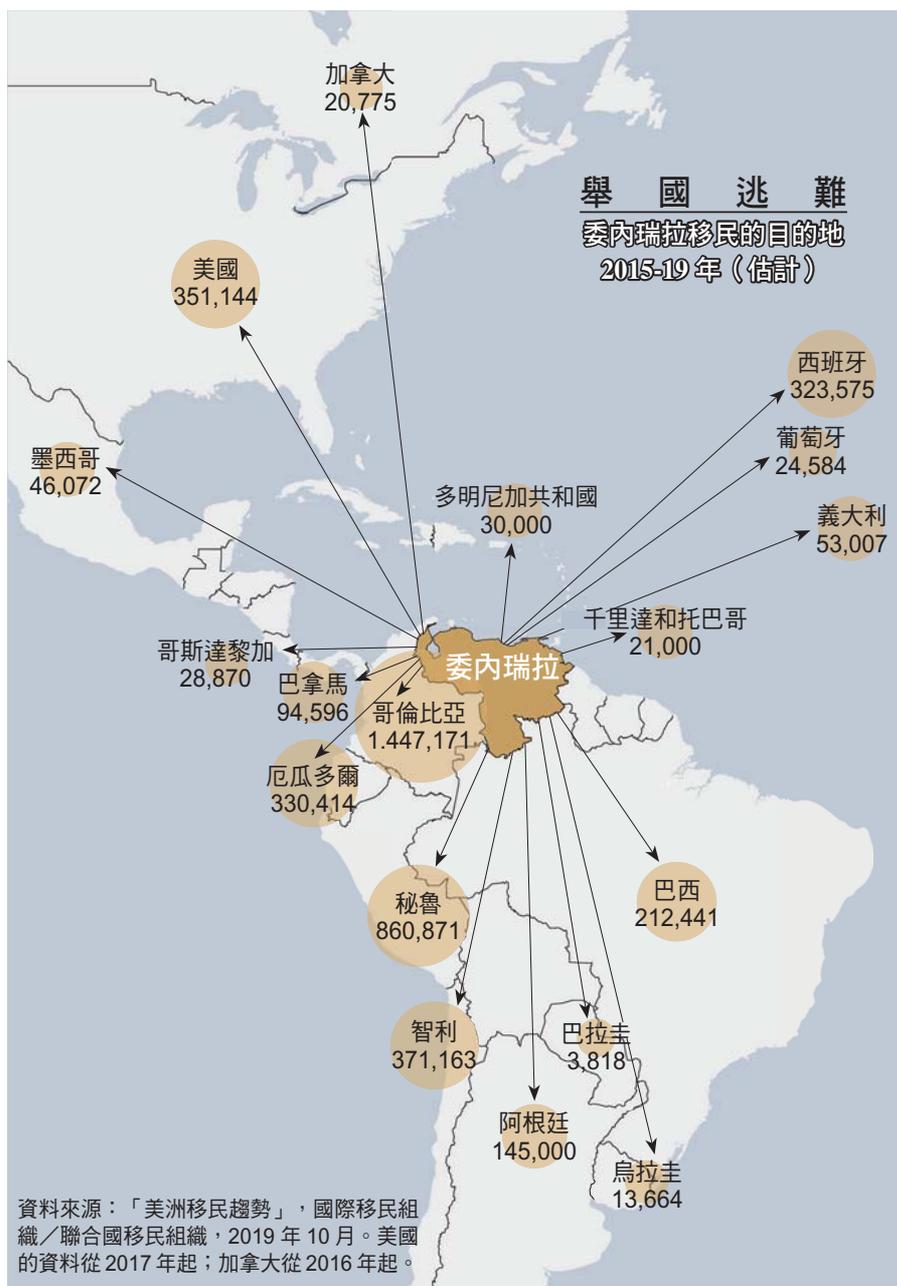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美洲移民趨勢」，國際移民組織/聯合國移民組織，2019年10月

「我曾質疑過政府的政策，」他解釋道。「[政府發行的]教科書省略了委內瑞拉的部分歷史，只強調與雨果·查維茲（1999 年至 2013 年，委內瑞拉總統）政府有關的事。」坎佩查諾在公開談論國定科書中的不準確之處和偏見後說，他的獎助金申請開始被拒絕受理。當他和他的家人決定去秘魯時，坎佩查諾去一家國有銀行申請信用卡，這樣他就可以用美元買機票。他再次被拒絕。「他們用這個方法來恐嚇我，」他說。當他在社交媒體上發佈這件事時，他收到了一封威脅性的電子郵件。

由於別無選擇，坎佩查諾問一位住在國外的朋友，是否願意幫他買一張去利馬的機票。坎佩查諾在秘魯北部城市特魯希略 (Trujillo) 的塞薩爾·瓦萊霍 (César Vallejo) 大學獲得一個職位，他過去經常作為客座講師訪問該城市，他在那裡排隊申請工作簽證。

坎佩查諾於 2017 年 3 月移居秘魯。4 個月後，他帶著妻子、2 個十幾歲的孩子和身患癌症的岳母來到秘魯。坎佩查諾說：「在最初的幾個月裡，4465 地區拉丁團結 (Fusión Latina) 網路扶輪社便是我的家人。」當他的岳母去

1,450 萬
哥倫比亞接受的
委內瑞拉人數
是所有國家中最多的



世時，他們的扶輪家庭安慰他們並給予支援。

坎佩查諾仍然與他在巴基西梅託的前扶輪社成員保持聯繫，他說儘管狀況艱苦，他們仍在從事服務。「現在已經沒有青少年交換計畫了，」他說。「他們一心一意想取得民生必需品給人們，比如食物和藥品。」委內瑞拉西部 4380

地區前總監阿爾貝托·阿韋利諾·卡馬卡羅·澤爾帕 (Alberto Avelino Camacaro Zerpa) 估計，該國 20% 至 30% 的扶輪社員和近 40% 的扶輪青年服務社社員已經離開委內瑞拉。然而，許多扶輪社在社員們有汽油和電可用時，仍繼續舉行例會。



你如何幫助

扶輪啟動了一些專案來幫助逃離委內瑞拉的人以及留在委內瑞拉的人

巴西：歡迎流離失所的家庭

「一年前，我走進巴西的一家麵包店，這時一個小女孩走過來，請我買些蛋糕給她，」范德雷·利馬·桑塔納 (Vanderlei Lima Santana) 回憶道。起初，桑塔納說不。但是女孩的母親解釋說，那天是她女兒的 9 歲生日，他們沒有東西可以吃。他走進去，買了一個杯子蛋糕給那個女孩，她是一個委內瑞拉移民。「那天回到家裡，我哭了，」桑塔納說。「我知道我必須做更多事來幫助這些人。」

從那時起，桑塔納和他的波瓦·維斯塔·卡薩利 (Boa Vista-Caçari) 扶輪社，與當地非營利組織、宗教組織以及政府的「歡迎行動」合作，為從委內瑞拉抵達巴西北部家庭提供日常三餐、藥物和職業發展機會。11 月，桑塔納因領導這個專案而在聯合國扶輪日受到表彰。如要瞭解詳細資訊，請透過 santana.delei@gmail.com 聯繫桑塔納。

哥倫比亞：給出走者帶來希望

他們被稱為「出走者」，正從委內瑞拉湧入哥倫比亞，尋找工作、住所和食物。休士頓網路扶輪社成員克里斯塔爾·蒙塔茲 (Cristal Montaiz) 說：「想像下一個人必須拋下所有東西，走路幾天的心理狀況。」

蒙塔茲是委內瑞拉人，也是長期的積極份子，他親眼目睹了難民潮如何淹沒哥倫比亞的社會服務組織。蒙塔茲和另一位來自委內瑞拉的休士頓電子扶輪社成員伊西斯·梅賈斯 (Isis Mejias) 受到激勵，成立了一個名為「委內瑞拉難民的希望」的專案；它沿著出走者的路線，在幾個地點向移民分發食物。該專案是由休士頓網路扶輪社和提供膳食的非營利性組織「起來反饑餓」合作。為了便於分發，網路扶輪社與哥倫比亞科庫塔 (Cúcuta) 扶輪社以及沿途的幾個食物銀行和庇護所合作。

梅賈斯說，休士頓網路扶輪社希望繼續為委內瑞拉難民帶來希望，但它需要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來支付專案管理費用（它也有賴於「起來反饑餓」的持續合作）。「委內瑞拉人正在祈禱像扶輪這樣的國際組織的善舉，」她說。如要瞭解詳細資訊，請到 mightycause.com/story/29ixvf。



克里斯塔爾·蒙塔茲提供食物給步行者。

委內瑞拉：支援社區

「日子一天比一天艱難，」住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何塞·貝爾納多·格瓦拉·普爾加 (José Bernardo Guevara Pulgar) 說。格瓦拉是一位人權律師，也是巴魯塔／拉斯梅塞德斯 (Baruta/Las Mercedes) 扶輪社的成員，他說最擔心缺乏藥品。醫療費用飛漲，即使專業人員的薪水也無法支付。「公共醫療保健處於崩潰的邊緣，」他說。「人們必須自備注射器和藥物。政府不提供這些東西。」

儘管生活條件艱苦，大多數扶輪社員仍留在委內瑞拉，許多扶輪社繼續舉行例會。委內瑞拉地區總監弗朗西斯科·莫雷洛 (Francisco Morello) 說：「我要留在這裡，為我的國家而戰。」「委內瑞拉正在經歷其歷史上最困難的內部危機，」委內瑞拉 4370 地區總監里卡多·迪亞茲 (Ricardo Diaz) 補充道。「我們需要藥品和醫療器械，例如超音波掃描儀，血糖儀和血壓計。」迪亞茲還表示，無論輪椅、拐杖和助行器的狀況如何，都需要。

「我請求扶輪社不要停止關注我們的國家，」迪亞茲說。「今天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助。明天我們可以幫助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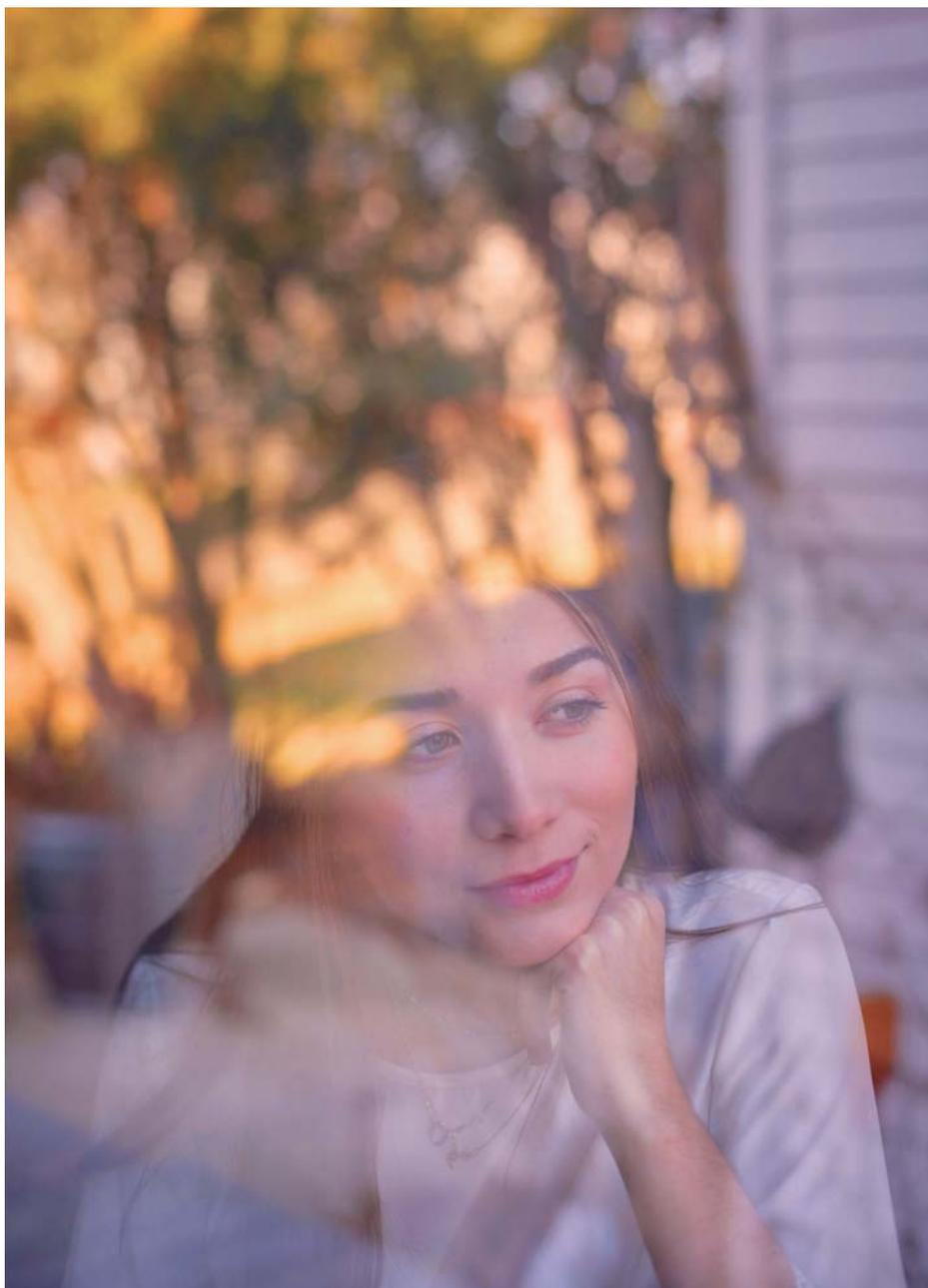
如要瞭解詳細資訊，請透過 ricardodiaz1964@hotmail.com 聯繫迪亞茲。

「我認為每個人出國留學後回國都會受到文化的反向衝擊，」維多利亞·加西亞·巴菲戈(Victoria Garcia Baffigo)說。「我經歷過，但是比之更糟。」

加西亞作為扶輪青年交換學生在伊利諾州奧羅拉市(Aurora)與戴夫·西格弗里德(Dave Siegfried)及其家人一起住，度過了2015-16學年後，他回國，遇上委內瑞拉局勢迅速惡化。「有些日子我們停電10小時，」她說。惡性通貨膨脹已經變得如此糟糕，以至於她的家人在超市裡幾乎買不起東西。

有一天，電話鈴響了。打電話的人告訴他們，他們綁了她的哥哥，要付贖金才能釋放他。謝天謝地，他們並沒有真正綁架他，她說。儘管如此，這個電話還是讓全家人感到驚慌失措。

奧羅拉日出(Aurora Sunrise)扶輪社成員克里斯·奧爾森(Chris Olson)一直在伊利諾州監視委內瑞拉的局勢。「克里斯告訴我們維多利亞已經回到委內瑞拉，她發現情況與離開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查理·施瑪爾茲(Charlie Schmalz)說，他和奧爾森和西格弗里德一樣，是奧



伊利諾州極光的維多利亞·加西亞·巴菲戈

羅拉日出扶輪社的成員。她花了所有的時間在這裡學習，現在她的前途整個被毀了。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此，我們一群人聚在一起，大家都說應該出點力。」

「克里斯打的第一個電話是給我媽媽的，然後我媽媽

跟我談了回美國的事，」加西亞說。「我從沒想過要留在美國，因為我的父母付不起我在那裡念書的費用，我想拿到大學學位。」

現在，加西亞有機會在美國獲得學位，因為奧羅拉日出扶輪社為她設立的基金可支

付全部費用。」「我仍然很難理解，」她說。「我不敢相信那些人會為我這麼做，他們又不是我的家人。」

整個安排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等待取得學生簽證。「有些航空公司開始撤出委內瑞拉，」施瑪爾茲的妻子瑪麗說。「維多利亞即將取得最後的證件，因此戴夫就買了一個機位，期待她能來。在航班起飛的前一天，維多利亞拿到了簽證。這是一個奇蹟。」

加西亞現在在奧羅拉大學讀三年級，主修生物和健康科學，輔修生物科技。她是家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雖然原先計畫輪換寄宿家庭，但她已經和查理和瑪麗·施瑪爾茲一起住兩年多了。「我們在棋盤遊戲和看電視上結下了不解之緣。」加西亞說。瑪麗補充說：「她很容易融入我們的生活方式。她就像我們的孫子一樣。」

儘管如此，這對夫婦知道加西亞想念她的家人，所以有一年耶誕節，他們給她一個驚喜：一張機票去看望她最近移民到秘魯的母親。當加西亞和她的母親住在委內瑞拉時，他們與留在那兒的祖母共用一間公寓。加西亞回憶道：「我們通常每天晚上都坐在祖母的床上，我媽媽、祖母和我會閒話家常。然後我做作業，媽媽做晚飯。我和奶奶經常讀同樣的書，一起討論內容。」

「有些日子我們 10 個小時都沒有電，」加西亞說。惡性通貨膨脹已經變得如此糟糕，以至於她的家人在超市裡幾乎買不起東西。

加西亞擔心祖母的健康，但她的叔叔，瓦倫西亞扶輪社社員，經常進入哥倫比亞

89%

收入不夠購買食物的
委內瑞拉人的比例

幫她買藥。「我的祖母擔心無法取得食物，」加西亞說。「她很擔心錢，怕她的錢不夠用。日子真的很難過。」加西亞希望完成學業後，有一天能在委內瑞拉再次見到她的祖母。

在那之前，她專心讀書，並與當地扶輪社談論她在美國的經歷和委內瑞拉的危機，讓人們更了解對她所愛的國家的人民遭受的痛苦。

「一開始，維多利亞經常難過，」瑪麗·施瑪爾茲說。「她會說，『我無法報答你這份情。』我告訴她，『我們不要你報答。你需要做的是，當你能夠幫助人時，你就去幫。』」

「我父親 8 月去世了，」赫雷拉說。「我感到 1% 的痛苦和 99% 的感激。我很感激他的仁慈心腸，我們需要幫忙時，他總是在那裡。」赫雷拉的父親去世時，他無法返回委內瑞拉；如果他回去委內瑞拉，他會被拒絕再進入墨西哥。當他知道父親希望他繼續嘗試在他的新家建立生活，他感到安慰。「我準備把我的家人接出來，」他說。「我對委內瑞拉的情況轉好，不抱任何希望。我的國家受到重創。布魯金斯學會估計，委內瑞拉移民的數量最終可能增至 800 萬，甚至超過逃離敘利亞的 600 萬人——然而，委內瑞拉人得到的國際援助還不到敘利亞難民的 10%。「移民最難的部分是改變你的心，」赫雷拉說。「當我在墨西哥遇到委內瑞拉人時，他們談論的第一件事就是委內瑞拉發生的壞事。」但赫雷拉選擇通過努力實現事業成功的夢想，來紀念他的父親。他甚至開了一個 Instagram 頁面，名為「移民邁向成功」；他用它來與他的 4,000 名追隨者分享鼓舞人心的引述。「必須重新開始並非全然壞事，」最近一篇貼文寫道。「它告訴我，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克勞迪亞·厄巴諾 (Claudia Urbano) 的其他研究和報告